

再现思想锋芒

感受民族进步

交锋

刘兰肖 编著

光明日报 出版社

交锋

刘兰肖 编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几代人
西部大
但是，
一系列
开发：直
献策。
地揭示
意义，旨
社会对
造有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代印记—穿行于中国百年报刊之林丛书(第二卷 交锋)/周伟主编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2.9

ISBN 7-80145-582-7

I.时… II.周… III.报刊—文化史—中国—现代 IV.G21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5999 号

编 著: 刘兰肖

出 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发 行: 新华书店

电 话: 010—62559981(发行)

82645453—608(著作权)

网 址: <http://www.bjgmmj.com>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787×1092)

印 张: 168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字号: ISBN 7-80145-582-7

定 价: 128.80 元 (全六册, 本册 19.80 元)

评论：时代发展风向标

中国报刊与西方报刊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西方资产阶级报刊的兴起主要是为了适应商业活动的需要，因此其最早出现的报刊文体是消息。而19世纪中国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报刊一开始就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所以中国资产阶级自办发行的报刊，言论早于消息出现。中国的新闻评论就在报刊政论中孕育而生了。

自1815年西方传教士创办中文报刊开始，中国的报刊评论就一直为外国人控制着。直到1874年，第一位到欧洲进行考察的中国学者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才有了近代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份宣传维新思想的报纸。王韬出生在江苏昆山，自幼好学聪颖，打下了深厚的儒学基础。1849年，因生活所迫，到上海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墨海书馆作翻译，逐渐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1862年因上书太平天国遭到通缉，流亡香港。1867年，他随西方传教士理雅各到欧洲，亲眼目睹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回到香港后，创办了这份报纸，宣传“变法自强”主张，成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报刊政论家，揭开了我国报刊言论史的第一页。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蓬勃开展起来。适应维新运动的需要，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办报高潮，资产阶级维新派把报纸作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与封建顽固派展开了斗争，并培养出了梁启超这样一位著名的报刊政论家。他作为维新运动的健将，写下了数百篇评论文章，创立了别具一格的“笔端常带感情”的“时务体”政论，风靡一时，影响深远，最终推动了报刊政论向新闻评论的演变。

回顾中国报刊言论产生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报刊言论是伴随着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产生而产生，在适应政治

斗争的需要中发展起来，并在不断继承我国优良的政论传统的基础上逐渐走向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刊言论就是时代的晴雨表，是中国社会进程的留声机。因此，尽管我们无法亲历整个 20 世纪的风雨，但是，从已经发黄的报纸评论的字里行间，也许能够体会到一种朦胧的现场感。

20 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辉煌和黯淡、光荣与梦想交织的时代，也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最迅速、影响最大的 100 年，当我们站在世纪的分水岭上回眸中国新闻评论所走过的百年风雨历程时，仿佛聆听时代在诉说，依稀可辨时代的足音。

1901 年到辛亥革命的十年间，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迁的年代，也是新闻评论日臻成熟的时期。1901 年，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沦为列强共管下的半殖民地国家。从此，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争夺铁路修筑权，霸占中国各地的采矿权，操纵中国沿海和内河轮船的航运，扩大在华工业投资；而清政府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实行了所谓的“新政”，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改革军制，修订法律，奖励游学，宣布实行“预备立宪”。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这个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辛丑条约》的巨大屈辱和沉重赔款，封建官僚政治的腐朽黑暗，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激化。这一切，并没有为不痛不痒的“新政”所掩盖，而是酿成了大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风暴，并最终推翻了这个名存实亡的封建王朝。在这样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整个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从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就形成的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报刊政论，获得了质的飞跃，孕育成熟了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评

论。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斗争和新闻评论有两条主线，一是针对清政府的“新政”议论评说，无论是《大公报》、《申报》这些保守的私营报刊，还是《新民丛报》、《民报》等党派报纸，全部参加了进来。二是在全国范围的反帝反清斗争中，新闻评论短兵相接，章士钊主办的《苏报》对《革命军》的宣传、《民报》和《新民丛报》的论战、于右任的《民呼》、《民吁》、《民立》，本身就构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评论日益成为报刊的灵魂。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在显要位置刊出自己的评论，表达自己的观点。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政论文体开始从单一的政论向多样化发展。

首先，政论文体作为激烈政治斗争的利器，在资产阶级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党派报刊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资产阶级在救亡图存时期所表现的奋发求变，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中国早期的著名报刊政论家梁启超自由奔放、感情充沛的“报章体”体现出来。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此时更表现出虎虎生气，他们创办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成为与资产阶级维新派进行政治斗争的主战场，而政论就是双方的斗争武器。白热化的短兵相接，淬砺了政论文体的战斗风格，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论中首次运用了形式逻辑的论证方法，并培养锻炼了以汪精卫、章太炎、汪东、胡汉民为代表的政论家。其次，一种真正具有新闻评论性质、突出了时效性和新闻性的评论文体——“时评”适应社会和时代斗争的需要，脱颖而出。1904年，《时报》总编辑陈景韩将政论体裁加以改变，开辟“时评”，使呆板冗长的长论变为冷隽精悍的短文，体现了精确、简短的原则。这种新的评论形式，对以后的新闻评论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历久而弥茂，至今光彩依旧。此外，梁启超也在《新民丛报》开辟了《国闻短评》专栏。这些短评，力求客观公正，有针对性。再次，社会日益动荡，越来越多的下层民众渴望了解现实，认识社会，从而推动新闻评论向白话化和大

众化方向发展。适应读者的要求,《中国白话报》的创办人林白水,首先在他的报纸上使用白话文写作评论,切实开启了新闻评论白话化和大众化的进程。他的代表作《大祸临门》,活泼上口,明快畅达。此外,介于政论和文学之间的杂文开始发育,其创始人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创刊的《新民丛报》上开辟了杂文专栏《饮冰室自由书》。同时,编者按语的运用范围日渐扩大。所有这一切,标志着我国的报刊评论已经从政论发展成为新闻评论了。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和随之而来的袁世凯复辟帝制,使报业经历了大起大落。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采取言论自由的政策,因而一度出现了中国报刊业发展的第二个高潮。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言人袁世凯窃取,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昙花一现,化为泡影。袁世凯上台后,假民主共和之名,行独裁专制之实,镇压人民的反抗,出卖国家的主权,妄图复辟帝制。为此,他钳制思想言论,摧残文化,制造“癸丑报灾”,使报业迅速畏缩。因此这一时期新闻评论的中心内容,一是为建设和捍卫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呼号;二是对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复辟阴谋而揭露和鞭挞。然而,在高压的统治下,除了反袁的《民立报》、《民权报》等坚持斗争外,一般报刊上的消息和通讯日渐增多,评论却不断减少,评论的战斗性也大大减弱。于右任在《民立报》上发表的评论则以文辞瑰丽,或“沉郁委婉”、或高亢激昂而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刘少少、宋教仁等人的评论也有一定影响。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国仍然处在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之下,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团,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与此同时,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开始对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文化进行反省和批判,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思想解放的潮流。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直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最终爆发了揭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篇章的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样一个革命与反动激烈交锋、新文化与旧思想反复较量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阶段,作为时代风向标的新闻评论在经历低谷之后再现生机,一方面从“不谈政治”到揭露北洋军阀的卖国与黑暗统治,一方面以《新青年》为阵地,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同封建旧文化展开论战,最终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中走向辉煌。

首先,评论为公众而写的群众性特点已成趋势。这主要表现在白话文逐渐取代言言文和半文半白的“报章体”,从而使新闻评论彻底摆脱旧式政论的窠臼,成为面向民众的时事政治评论。《新青年》发表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大力倡导白话文写作,并迅速为各种报刊所采纳。除了《申报》、《新闻报》等老牌报纸仍然使用文言文以外,多数报刊推广了白话文。其次,将消息与评论有机结合的述评这一评论体裁逐渐成熟起来。如《新青年》的《国内大事记》、《国外大事记》是较有代表性的述评形式。其三,把文学与评论融合在一起的杂文也有了新的发展。著名无产阶级文学家鲁迅在这一时期将旧有的杂文文体加以改造,形成了极具战斗性的现代杂文。《新青年》的“随感录”是当时著名的杂文专栏。其四,在写作风格上,这一时期自由洒脱、开放灵活的评论强烈体现了科学民主,崇尚个性自由的文化立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最具光彩的无产阶级新闻评论诞生了。无产阶级新闻评论经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新闻实践逐渐成熟起来,他们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作为分析社会现实问题的指南，以质朴的语言、透彻的说理，饱满的无产阶级革命激情，开创了新闻评论的新天地。这一切说明，适应新文化运动和迅速变化的国内外局势的时代要求，是五四时期新闻评论自身发展的原动力。

二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的几年间，无产阶级的报刊评论继续向前发展，而资产阶级报纸政治上逐渐右转，新闻评论再度沉寂。北方的军阀混战绵延不断，北京政府变更频繁，上演了一幕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并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群众反帝斗争。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右”倾错误和国民党“右派”的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最终失败。因此，这一时期的新闻评论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露各派军阀的混战及其统治的黑暗，二是反映反帝爱国的工农运动和革命统一战线，三是追踪北伐战争的风云。

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纷纭复杂的多事之秋，无产阶级的报刊评论以全新的风格展现出顽强的生机和活力，培育了毛泽东、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一大批杰出的无产阶级报刊政论家。他们主办的《向导》、《中国青年》、《政治周报》等报刊，以其富有战斗性的革命政论文作为发动群众、提高人民的斗争觉悟、打击和揭露革命敌人的战斗工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资产阶级主办的私营报纸，此时因政治环境的压迫和报纸的商业化，评论在写作风格上倾向于采用含蓄的笔法，多因事而发，借题发挥。同时，评论形式日益减少，具有感情色彩、富有号召力的评论也销声匿迹。不过，此时的评论界仍有可圈可点之处，如上海《商报》陈布雷的评论，被称为

“文坛寂寞中的异军”；而中国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奠基者邵飘萍在他主办的《京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以短而精的形式，富有变化的风格，表现出很强的战斗性；曾经开白话评论之先河的著名新闻评论家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的具有独特写作风格的评论，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夹叙夹议，往往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于政局，风靡一时。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1927年4月，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大肆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与此同时，国民党各派之间联合进行“北伐”，并实现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随着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再次使中原战火蔓延。直到1930年11月，蒋介石才打败了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李仁等各派反对势力，巩固了其独裁统治，并腾出手来对付红军。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失败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实现了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这样，在中国的大地上，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对峙。因此，这一时期的新闻评论，集中反映了这两种政权的斗争和演变。红色政权的发展，却因国民党的新闻统治政策而被封锁。也正是因为国民党的新闻统治政策，国统区的新闻评论依然没有起色，稍有论战性的评论也多讲究策略，采用春秋笔法。现代著名资产阶级报刊评论家、《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这一时期，曾经写下了不少具有影响力的评论作品。但是从1928年开始，一向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公允中立原则的《大公报》，也开始发生了转变。红色政权方面，各个革命根据地创办了各种宣传革命的报刊。1930年，又在国统区白色恐怖中创办了《红旗日报》，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张地下出版的日报。但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此时在中共中央占据了领导地位，所以在报纸评论上出现了许多左的错误和过火的言论，产生的宣传效果并不好。

“九·一八”事变后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一些民族资产阶级报刊的发展变化，《申报》、《大公报》等增加了评论的分量，新闻评论在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及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得到了洗礼，焕发生机。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不到半年时间侵占了整个东三省。1932年，又发动“一·二八事变”，入侵上海。1933年，侵华日军向山海关发起进攻。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民族危机在一步步加深，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却步步妥协，执行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成为蒋介石政权的大政方针，《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一次次对日本的侵略妥协退让。开展了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一步步加紧对红军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实现了北上抗日。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东北抗日义勇军、淞沪抗战、长城抗战、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最终促成了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中华民族凝聚成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血肉长城。

在这样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报纸围绕民族危机这个社会现实开展评论。围绕这个主线，国统区的新闻评论一方面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歌颂奋起抗战的将士，代表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呼声。另一方面，谴责和抨击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要求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的报刊评论则在反对蒋介石的“围剿”、揭露其不抵抗政策、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新闻评论本身也在战斗的洗礼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的报刊评论家邹韬奋，他在《生活日报》的小言论代表了报纸评论的大众化趋向。他坚持为最大多数的群众服务，其评论

紧密联系社会、紧密联系读者，抒发了人民大众的心声，在 30 年代的评论界独树一帜，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同时，这一时期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使杂文这一具有很强战斗性的文体再度发挥了作用。无产阶级的宣传家鲁迅，在这一时期写下了大量的杂文作品，他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以杂文为武器，服务于当时的现实斗争。他的杂文生动、泼辣，有匕首和投枪的锋利，为杂文的发展和当时的社会政治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世界日报》张友渔和张恨水的时评和杂文，也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中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的新闻事业发展不平衡，因此也就存在着三种不同立场和世界观的新闻评论，产生了不同效果的社会反响。但总的来说，报纸评论的战斗性比以往大大加强，批评不利抗战的各种弊端的评论、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评论和军事评论大量刊载，与抗战无关的评论一度绝迹。

在这样一个全民族抗战的战争年代，全中国汇成了一个声音——抗战。三种性质的新闻评论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时代斗争的要求，反映中国人民的抗日烽火，反对汪伪集团的妥协投降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积极反共。新闻评论在严酷复杂的战争中有新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报纸，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为代表，以深刻中肯的洞察力，高屋建瓴的气魄，尖锐泼辣的战斗文风，在新闻评论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42 年《解放日报》改版后，评论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加强，社论和署名评论在文风上讲求通俗化、口语化，社论和消息、通讯等紧密配合，改变了以前社论孤悬版面的状况。生动鲜明、朴实通俗的群众性评论，标志着评论走向了大众化。同时，进步

的私营报纸的评论也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战斗性。《申报》、《大公报》等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涌现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脍炙人口的评论作品。此外，新式标点符号逐渐普及，促使评论文字迅速通俗化，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抗战形势、投入抗战洪流的要求。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政权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解放战争爆发。由于国民党从政治经济上压制打击，国统区的报刊经历了最黑暗的时代，为统一舆论而写的“联合社论”的评论充斥报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揭露国民党贪污腐败的评论开始增加。解放区的报纸逐步树立了与旧式报纸有本质不同的新闻评论风格。

1945年8月28日，蒋介石玩弄和平谈判的阴谋，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并于1946年1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停战协定。但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6月底，内战爆发。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很快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从防御转入进攻。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底，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1949年4月23日，解放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推翻了统治中国22年的蒋家王朝，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在人民战争的海洋中，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党派与国统区各阶层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构成了反蒋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人民战争的胜利。

在这样一个双方力量决战的时刻，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的报刊言论以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代表了不同的政治立场，集中围绕着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人民战争、反蒋反内战三方面发表评论，新闻评论再次出现正面交锋。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与中国共产党《新华日报》、《新华日报》与当时亲蒋的《大公报》，在1946年展开了白热化的斗争。由于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异常激烈，政治观念对新闻文体

的影响使新闻评论倾向于新闻的教化功能。解放区的报刊评论中,1947年《晋绥日报》的反对“客里空”,使评论的思想性、论战性增强,同时以风格明快的编者按语活跃版面,引导读者,很受欢迎。无产阶级新闻评论具有了完全不同于其他报刊评论的风格:坚持宣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问题,做党和人民的喉舌,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具有现实针对性和权威性,切实担负起了发动民众和指导革命的重任。

四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闻评论也揭开了新的一页。从1949年到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这一时期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评论逐步发展起来,各级党报对评论尤其是社论高度重视,新闻评论数量增加,出现了编辑部文章这样一种评论体裁。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这是继《解放日报》改版后党报的第二次改革,评论的题材扩大,群众言论进入新闻评论领域,文风上也大有改进,贴近生活的百姓话题增多了。

这一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经济建设成为全国全党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在建立新中国以后,领导着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工作。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秩序,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到开展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分子,进行“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战争;从制定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三大改造,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这一时期的辉煌成就,成为新闻评论的主要内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阐述党提出的各项建设任务,动员人民群众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目标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引导和宣传作用。在这个过程中,阐述型社论受到欢迎。陈云的《为什么要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李立三

的《学会管理企业》等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但是这一时期的新闻评论也出现了一些偏差。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反党集团的斗争,新闻评论在其中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

1957年,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曲折发展时期,到1966年文革前的10年间,评论工作出现了不少“左”的偏差。1957年,在整风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新闻评论出现了不顾客观现实的盲目夸大的宣传,如《人民公社前途无量》、《大搞土法炼钢》评论作品,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脱离了社会实际,违背了新闻评论的客观性、真实性原则。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纷纷建成。适应这种新的形势,针对重点工程的经济价值和社会影响的评论作品多了起来。《伟大的理想实现了》、《在“世界屋脊”上创造幸福生活》等成为广为传诵的优秀评论。由于自然灾害、“左”的错误和苏联的背信弃义,从1959年到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六十年代初期,党在各方面克服“左”的错误,进行全面的调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新闻评论也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60年代初期新闻改革中,报纸尝试增加知识性、趣味性,从而出现杂文创作的再次繁荣。较有影响的杂文专栏有《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这一专栏由著名的无产阶级新闻评论家邓拓主持,针对当时的人们的思想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把知识性和思想性完美结合起来,写下了《三种诸葛亮》、《从三不知到三知》等一批优秀杂文作品。著名评论家吴晗的《谈框框》、《谈骨气》等杂文也产生了积极强烈的反响。此外,在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英雄辈出。高唱英雄的赞歌,鼓舞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也成为新闻评论的一大焦点。《论雷锋》、《又一曲共产主义的

《赞歌》、《向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等评论文章在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影响了几代青年的人生选择。

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报纸评论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个人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使新闻评论沦为“无中生有、无须论证、无限拔高、无限上纲”的“四无评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起哄式评论、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洞无物的“演绎法”评论。评论形成以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以往经验及最近的典型事实为说理的依据的“新八股”。新闻评论几乎成了“四人帮”制造政治谎言的工具,成了他们扣“帽子”、打“棍子”的手段。

在这场内乱的发动过程中,新闻评论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评论队伍中出现了姚文元这样的文痞,其发迹就是靠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随意诬陷,而这两篇评论也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而“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的评论,借“风庆轮”事件、小学生日记、“白卷英雄”等大做文章,无须论证,无须解释,哗众取宠,包藏祸心。同时,新闻评论的无限拔高,充满了空话、废话、假话,借用革命导师的语言,装腔作势,蒙骗群众,混淆视听。如《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的评论,横行一时。在这样一个持续10年的浩劫中,人民群众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中央在周恩来和邓小平主持工作时期努力纠正“左”的错误,发表了《夺取新的胜利》等具有重大影响的评论。但是,由于“四人帮”把持新闻舆论,新闻评论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滑向堕落的泥潭。

1976年粉碎“四人帮”,全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并于1978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因

此,这一时期既是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转折点,也是新闻评论观的重建时期。新闻评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历史转折的关头,新闻评论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年,《光明日报》首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解放了思想,统一了认识,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新闻评论也在这场讨论中彻底摆脱了“左”的流毒的影响,在内容上坚持实事求是,在文风上呈现出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清新气象,出现了一批很有特色的评论作品。

1980年《人民日报》改版,重点增加了一批短小精悍的评论栏目,专栏评论这种兴起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具有“民间色彩”的评论形式从此成为新闻评论的后起之秀。如《新民晚报》的《未晚谈》、《人民日报》的《今日谈》等,从内容到形式都丰富多彩。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评论逐步成为新闻评论的主体。新闻评论越来越强调新闻性、群众性。从灌输式向讨论式,从回避现实到面对现实矛盾,从单侧面向多侧面,从指导性向服务性,凸显了新闻评论的舆论引导功能。同时,由于这一时期处于伟大的历史性转折阶段,需要解决的难点、热点很多,因此,特约评论员文章广泛被评论界采用,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起到了积极作用。

1982年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在此后的10年中,我国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教育、文化、科技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改革。这一时期的新闻评论为改革开放清除思想障碍,正确、全面、生动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用联系的观点、系统的观点、发展的观点,从实际工作的角度分析中央的各项政策,同时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和群众的愿望结合起来。对热点的引导讲究艺术性,行文有波澜,进行形象化的说理。如《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切实发挥了引导舆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推动